

景志远

黄静林著

辨奸新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辨 奸 新 论

景志远 黄静林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黄彦 李淮春
封面设计 祝东平

辨奸新论

景志远 黄静林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 39 号)

兵器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11.25

1991 年 8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50 千 册数: 1-20 000

*

ISBN 7-300-01201-9

K·126 定价: 5.80 元

目 录

绪论 (1)

奸，是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现象，是颇具政治色彩的道德伦理范畴。在浩浩几千年的历史，由于察奸无方、制奸无术，而致邦殄国丧、民族沦亡者，实不乏其例。故尔分善恶、辨忠奸、实乃国家兴亡之所在，人民安危之所依，事业成败之所系。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察过往而思现在想未来，察奸辨奸，斗奸制奸，确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第一章 历史的起诉 (23)

在中华民族漫长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民族的兴盛与尊严、为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了人民的富裕与文明，无数仁人志士，呕心沥血、奋力抗争、竭尽忠诚。然而，那些奸佞小人却为了一己的私利，助纣为虐，祸国殃民，一手促成了我们民族的屈辱史，人民的苦难史，国家的黑暗史，社会的动荡史。他们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深重罪孽，纵然罄南山之竹亦难书，倾东海之水也难尽。

第二章 时代的遗憾 (49)

千百年来，我们民族的先贤明哲，为了辨奸制奸、作过许多实践上的努力和理论上的探索，他们著述立论、详析力陈，进行了颇为有益的探索，给后人留下许多值得借鉴、引人深省，甚至不乏精当的阐发和议论。有许多至今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成为人类历史辨奸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在私有制为基础的腐朽政治制度下，不可能形成系统、科学的辨奸理论，不可能有彻底根除奸佞的实践。实体繁而花萼振。中国历来的辨奸理论和实践都离不开奴隶、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这棵树，本不固则枝不荣，枝不荣则花不盛，花不盛而果不硕。这就是时代的局限和遗憾。建立崭新的辨奸理论，并使之真正付诸实践，这伟大的历史使命，自然落在了我们的肩上。

第三章 伟大的坐标 (81)

我们应当十分感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他们在总结人类社会一切已有的科学成果

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们所提出的阶级的、民族的、人民的、历史的、社会进步和生产发展的观点可以作为我们辨别忠奸善恶的正确立场和客观标准，这样就可以避免以往非科学的空碎辨奸理论之失，也可以摒弃以往仅仅仰赖帝力天恩、圣主明君制奸之短，从而逐渐建立起科学的辨奸制奸理论。

第四章 奸源的探索 (108)

树有根，水有源。奸佞猖獗几千年，自有其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择其荦荦大端，可以看到：私有制的存在是生奸的土壤，反动腐朽的道德意识是萌奸的温床，政治制度的黑暗是养奸的产房，社会局势的动荡是成奸的摇篮。

第五章 奸性的剖析 (135)

贪恋荣华，弃国家如瓦砾；趋福避祸，视苍生如草芥。争权夺利，虽父子而不让；野心勃勃，是弟兄亦相残。排陷忠良，必得手而后已；嫉贤妒能，置死地

而后快。迎合上意，以献媚而取宠；导君为虐，用邪道以授人。忘恩负义，化良知为乌有；过河拆桥，为常人难置信。贪功诿过，推罪责于他人；欺世盗名，据功劳为己有。排斥异己，逐良俊出朝堂；滥用私人，引小人入宫门。穷凶极恶，虽豺狼而难比；残忍阴毒，是蛇蝎亦不及。两面三刀，耍阴谋以得道；阳奉阴违，放暗箭而伤人。——这就是奸性的证明。

第六章 奸亦有其道 (169)

无奸心不足以萌其奸，无奸行不足以成其奸，无奸术不足以济其奸。奸佞小人大多有一个蓄奸心而萌其奸，践奸行而成其奸，施奸术而展其奸的演进过程。当他们萌其奸心，需要得到赏识与信任的时候，常常会采取殷勤侍候，以邀其亲；投其所好，以邀其宠；大表忠心，以邀其信；溜须拍马，以欢其心的取宠术。当他们张其奸势，需要得到支持与亲附的时候，常常会采取施恩布惠以收民心；炫耀权势以得亲附；杀人树威以取敬畏的树威术。当他们展其奸行，需要推倒前进路上障碍的时候，常常会采

取挑拨离间，谗言伤人；明扬暗抑，阴谋整人；栽赃陷害，血口喷人；暴过扬丑，借机害人；挑动事端，借刀杀人的整人术。他们在这方面的创造，层出不穷、变幻莫测，且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真可谓盗亦有道、奸亦有其道。

第七章 拨开假象的迷雾 ……… (192)

假是奸佞小人的本质特征之一。他们取信于人，靠假仁假义；加害于人，靠假词假证；接人待物，靠假心假意。他们说假话、办假事、通过假象来讨得欢心、赢得人心，包藏祸心，以逞私心，实现野心。因而，他们常常自饰伪装：一曰装老实，二曰装正经，三曰装糊涂，四曰装宽容，五曰装昏庸，六曰装贤明，七曰装博学，八曰装勤恳，九曰装忠诚，十曰装笨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为此，我们必须坚持群众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全面历史的观点，方能戳穿假象，还其本来面目。

第八章 切莫等闲看奸佞 ……… (219)

奸佞小人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为祸甚

烈，必然有其“过人之处”。他们一是老于事故；二是敏于思察；三是工于心计；四是精于权谋；五是长于应变；六是勤于周旋；七是肯于下注；八是敢于冒险；九是善于韬晦；十是巧于辞令。特别是那些大奸巨滑者，必然是心眼坏，为害深，地位高，才学大者。我们万不可掉以轻心。

第九章 战胜人性的弱点 ……… (240)

不售奸则不成其为奸佞，然奸佞所以能得逞，自然有其主观和客观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善察人意，善于利用各种各样的人的弱点或曰人性的各种弱点。自古以来因浮而信奸，因私而顺奸，因懦而惧奸，因昏而纵奸，因慈而养奸；因弱而受奸者，实在不胜枚举，教训十分沉痛而深刻。为此，必须战胜人性的弱点，生防奸之心，长拒奸之德，备察奸之智，激斗奸之勇，习制奸之术，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

第十章 辨人奸而察己过 ……… (272)

思往事以知来者，辨人奸而察己过。当

我们在鞭挞丑恶的时候，莫忘了检点自己。真正要做一个好人，常常需要有自知之明，自励之心，自律之行。还要清楚君子与小人行行为上的区分，认识到：君子立公，小人树私；君子讲团结，小人讲勾结；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暴人之过；君子谋于庙堂之上，小人专门背后捣鬼。以使我们去私心，立公意，防止自己滑入奸邪之道。

第十一章 疑似之迹当慎察 …… (307)

“奸”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严肃概念，这一概念既有其特定的包容性，也有其严格的规定性。既不能随意缩小，也不能无端扩大。“疑似之迹，不可不察。”我们对“奸”这一严肃用语，不能随便使用，不能随便滥用，不可到处搬用，在给“奸”作科学界定时，一是要把它和方法策略区别开来；二是要把它和缺点错误区别开来；三是要把它和聪明才智区别开来；四是要把它和兵家权谋区别开来。并且在实践中要注意不能以个人好恶指人为奸；不能以一己之心疑人为奸；不能以政见不同斥人为奸；不能以一家恩怨贬人为奸；不能以流言蜚语定人为

奸；不能以一日之短认人为奸。

让历史告诉未来 (332)

几千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人类在经历了无数的痛苦与磨难之后逐步走向大彻大悟。他们在历史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1. 消灭私有制的伟大理想是不可动摇的；2. 建设“四化”干部队伍的道路上是不可改变的；3.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认识工具是不可替代的；4.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旗帜是不可放松的。而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历史步伐是不可阻挡的。

后记 (357)

绪 论

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仲秋10月，一位形容疲惫的老人，拖着沉重的步履，迎着飒飒的西风，扶着儿子的灵柩来到了钟山脚下。从此以后，晨钟暮鼓打发着他的风烛残年，青灯黄卷伴随着他的孤寂人生。他常常只身孤影徘徊于松间林下，也常常独坐静庐，反复地、默默地、莫名其妙地书写着“福建子”三个字。

物换斗移，月落星沉，又是一个秋天，又是一个秋天的傍晚，他登上钟山，极目远眺，但

见澄江似练，翠峰如簇——面对这图画难足的大好河山，往昔的峥嵘岁月与目下的凄凉晚景，都一齐涌上心头，使他不期而缓缓吟诵道：“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念往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多少渴望，多少憧憬，多少悲愤，多少悔恨，全都注入到了这首词中。这个老人，便是被署苏洵之名的《辨奸论》的作者指斥为“大奸慝”，但却受到列宁赞许的王安石；这首词，便是他被二次罢相，归隐江宁，择居半山寺后所写的千古绝唱《桂枝香·金陵怀古》。

王安石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人家。据《宋史·王安石传》载，他“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他的才学受到了包括当时已是文坛领袖、朝廷重臣的欧阳修在内的许多人的赞许。他们极其推崇他的才华，广泛地为他传播声名。因此，他在二十岁刚刚出头时便进士及第，被授予官职。这时，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在他人生的旅途上可以说处处铺满了鲜花，他完全可以有一个锦绣的前程。但是，历史却需要他成为一个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献身的人。

王安石生活在我国历史上国力非常衰弱的北宋时期。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由于长期推行庇护和纵容大官僚、大地主阶层的政策，“不抑兼并”，“不立田制”，因而使他们竞相兼并农民田地，以致造成“势官富强、占田无限”的严重局面。加上残酷的地租、高利贷剥削和种种苛捐杂税，使广大农民极其贫困，无法生存。一些中小地主也由于大官僚、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和负担不起沉重的赋役而破产。同时，北宋王朝有鉴于唐亡于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不敢把兵权授之在外的

将帅，绝大多数的军队也留守在京城开封附近。这虽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和巩固，但却极大地削弱了边防，使北方和西北方外患日益严重，不得不每年向辽和西夏输纳白银几十万两和绢几十万匹，以换取暂时的苟安。这些白银和绢转嫁到农民身上，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负担，也使国家财政亏空越来越大。到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国家亏空高达1500多万两，北宋王朝已经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地步。

生活在这种境况中，王安石从小就产生了一种慨然万里的青云之志，泽加于民的济世之心。特别是后来他在做地方官的日子里，亲眼目睹了北宋王朝积弱积贫的局面，看到了“日射地穿千里赤，风吹沙度满城黄”的情景，不禁发出了“贱术虽工难自献，心忧天下独君王”的感叹，毅然选择了一条变法图强的道路，设想能够抑止兼并，稍宽民力，以固国本，挽回岌岌可危的江山社稷。因此，列宁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一文中赞许地称其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但是，非常遗憾，王安石虽然报国有志，可惜生不逢时。在大地主、大官僚守旧派占绝对优势的北宋王朝，熙宁变法从一开始就很少有乐观可言。而他个人作为封建历史人物的局限性以及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缺陷，特别是识人用人上的致命弱点，也必然地阻碍了他政治理想的实现。

洛阳城里见秋风，
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恐匆匆说不尽，
行人临发又开封。

对于唐代诗人张籍的诗，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的评价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然而颇具宰相之风和文史之才的王安石虽然注意到了张籍的诗文，却没有注意到他的为人。其实，恰恰是张籍的为人才更值得王安石去品评，琢磨。

张籍少小离家，四处奔波，备尝人间冷暖，饱经世上风霜。“骨肉望我欢，乡里望我荣”，但他奔波西与东，“憔悴竟无成”！直到后来，孟郊等人向韩愈盛赞张籍的诗文，才引起了韩愈的注意，于是将张籍接到家中，交谈之余，对其赞叹不已，便留张籍于家，供他在馆内读书。次年秋天，汴州举进士，韩愈为主考官，张籍高中头名。接着他又去长安参加贞元十三年（797）的进士考试，又一举及第。正可谓“十年首登龙虎榜，一朝身到凤凰池”啊！韩愈与张籍素昧平生，萍水相逢，竟如此推诚相助，这在一般人看来，简直是恩同再造，虽结草衔环，肝脑涂地，也不足报万一。然而，张籍对韩愈并没有一味地感恩戴德，颂扬备至，而是采取了赞玉之美、不掩其瑕的真诚相见态度。他曾修书一封，严肃地指出韩愈的三个缺点：一是“喜博塞”，即喜欢赌博；二是“尚杂说”，即崇尚荒诞离奇的小说；三是“议论好胜人”，即好以口舌屈人，逞一时之胜。还批评他不潜心著书立说，以求名垂后世。《旧唐书》与《新唐书》在叙述这件事情的过程中，都十分推崇张籍为本色。应当说，这种推崇对于警世省人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最起码他可以告诉人们：真朋友可以相互切磋，假朋友却只能相互吹捧。真朋友绝不因朋友有恩于己便放任他的缺点，假朋友却只有在朋友倒下时才指责他的错误。

但是，对张籍诗文十分熟悉的王安石，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他腰悬相印，主持变法以后，对于善于吹捧他、迎合他的吕惠卿之辈，以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邓绾之流倍加器重，致使一些趋炎附势、投机钻营之徒，借拥护新政之名，混进了变法的领导集团。在王安石春风得意的时候，司马光也曾像张籍对待韩愈一样，修书一封，严肃指出：“谄谀之士，于公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矣。”（司马光：《与王介甫书》）。如果说司马光作为新政的政敌，他的话难免失之偏颇的话，那么，他弟弟王安国的话他总是该听一听的吧？据《宋史》载，王安石登上相位之后，曾告诫在西京任国子教授，“颇耽于声色”的弟弟王安国要“放郑声”。而弟弟王安国却回信亦希望他“远佞人”。有一次，宋神宗召见王安国，问他自“卿兄秉政”以来，外面舆论如何。王安国直言不讳地说：“都恨他知人不明，聚敛太急呢！”但处于巅峰状态的王安石，已经听不进这些逆耳忠言了。后来，当王安石受到上下夹击，被迫离开相位时，那些原来将其奉为“孔圣”的吕惠卿之流马上变了脸，非但不来救助，反而落井下石，甚至不惜发其“某某事不可让圣上知道”的私书进行攻讦，确实是不遗余力。在这场斗争中，王安石唯一的儿子也不胜打击发病而死。因此，王安石归隐江陵以后，孤苦伶仃，无以自解，常常独坐桌前，反复书写“福建子”三个字（吕惠卿是福建人），悔恨自己用了吕惠卿。但事已至此，悔之晚矣。不久以后，王安石便带着满腹的悔恨，离开了人间。

对于这件事，苏辙曾满腔怒火地条奏吕惠卿其奸说：“惠卿怀张汤之辩诈，有卢杞之奸邪……安石于惠卿有卵翼之

恩，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之，及势力相轧，化为敌仇，发其私书，不遗余力。犬彘之所不为，吕惠卿为之。昔吕布事丁原则杀丁原，事董卓则杀董卓；刘牢之事王恭则反王恭，事司马元显则反元显。故曹操、桓玄终畏而诛之。如惠卿之恶，纵未正典刑，犹当投畀四裔，以御魑魅。”（《宋史·吕惠卿传》）

其实，在旧时代，这远非王安石一家一户的悲剧。历史上，由于识人不准，用人不当，以致于邦殄国丧，家破人亡而懊恼不已，叫苦不迭的事，实在是不胜枚举。

我国在唐代曾经历过一段令人眩目的黄金时期。唐玄宗拨乱反正，励精图治，克己纳谏，选贤任能，开创了鼎盛繁华的开元盛世。可是后来，他用李林甫为相，罢免了张九龄，谏诤之路遂绝，“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唐王朝迅速走了下坡路。特别是后来他又用杨国忠，宠安禄山，终于激起“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更是陷入了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境地。后人每每想到这样一段历史，都不能不伤心扼腕。

唐明皇李隆基是唐睿宗第二子，自幼聪睿英武，才智过人，二十六岁作临淄王，曾出任潞州别驾。他在受韦皇后诬陷，被免官回京闲住期间，目睹韦皇后谋权篡位、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切齿痛恨，于是结交忠正之人，招集必死之士，在韦皇后毒杀中宗，准备灭唐兴韦，自己登基称帝之际，以极大的勇气，发动羽林军，一举铲除了韦皇后、安乐公主集团，当上了皇太子，并登上了大唐天子的宝座。在此之后，他又镇压了阴谋政变的太平公主集团，扶正祛邪，除旧布新，终于带领唐王朝进入了自己的全盛时期——开元、